DOI: 10. 3724/2097-3063. 20250039　　CSTR: 32092. 14. PA. 20250039

论北方地区万年遗存的选址

孟庆旭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长春 130033

摘　要　近年来，距今万年前后的文化遗存备受关注，吉林省也将开展专项考古调查。为更好地开展调查工作，本文对北方地区万年文化遗存进行梳理。从选址上看，北方地区万年文化遗存可分为四类：其一，选址于山区河流两岸台地；其二，选址于平原河流两岸；其三，选址于丘陵溪谷；其四，选址于平原湖畔。结合清理出的遗迹、遗物，可构建起距今万年前后人类社会发展变迁框架，人类最早生活于河流尤其是山区河流两岸，在强化采集生业过程中发展了磨制技术并发明陶器，随后迁徙至资源丰富的丘陵和平原湖岸，开始定居生活，可能形成专门墓葬区，也有少数人埋葬于迁居地。通过上述框架，本文旨在为距今万年遗存专项考古调查确定重点对象。

关键词　遗址；房址；陶器；采集

1　前言

自1962年江西仙人洞遗址的考古工作发现距今1万年左右的遗存开始[1]，万年左右的遗存层出不穷，这些遗存出土的陶器备受考古学者关注，盖因陶器不仅是划分新、旧石器时代的重要标识，而且是划分考古学文化的基础要素。因为万年左右陶器遗存的普遍发现，万年文化史的概念被提出并广泛传播使用。

2007年，吉林省在白城双塔遗址发现距今万年左右的遗存[2]，在2011—2015年发掘的大安后套木嘎遗址辨识出距今万年左右的遗存[3]，此后在对科尔沁沙地的考古调查中，也发现少量距今万年左右的陶器遗存[4]。仅从双塔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的考古发现来看，二者的万年陶器遗存既有年代、工艺上的差异，也有一定的联系。为了全面了解吉林省境内距今万年左右遗存的面貌，吉林省将在省级文化遗产保护资金的支持下，对距今万年遗存开展专项考古调查。作为万年遗存重要标识和考古调查主要采集对象的陶器，具有少、小、易碎等特点，不易被发现。为了更好地开展调查，我们梳理总结北方地区已发现的万年遗存选址特点，以便更有针对性地开展工作。

收稿日期：2025-05-15；**接受日期**：2025-10-30

作者简介：孟庆旭，副研究馆员，主要从事东北地区考古学研究。E-mail：mengqingxu2006@126.com

2 遗存概况

北方地区发现的距今万年左右遗存主要有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5]、北京怀柔转年遗址[6]、河北阳原于家沟遗址[7]、北京门头沟东胡林遗址[8]、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9-11]、河北尚义四台遗址[12]、河北康保兴隆遗址[13,14]、黑龙江饶河小南山遗址[15,16]、山东淄博赵家徐姚遗址[17]，以及上文提到的双塔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内蒙古化德四麻沟遗址[18]和裕民遗址[19]的年代上限虽然没到万年左右，但是与北方地区万年文化遗存联系较大，所以一并统计入表1。河南许昌灵井遗址[20]、山东沂源扁扁洞遗址[21]也曾有距今万年左右陶片出土，但目前尚无明确的报告记录出土信息，暂不讨论。

这些遗址多公布有测年数据，测年方法采用碳十四测年并配合树轮校正，该方法是通过对遗址含碳样品中放射性碳十四量的检测和树轮校正分析来判断样品从计时零点（生物体死亡或含碳沉积物形成）开始至今（1950年）的日历年龄，进而推断遗址、遗迹、遗物或文化层的绝对年代，是晚更新世晚期和全新世考古测年中精确度较高、应用最早且最广的一种测年方法[22]。为确保测年数据的准确性，在实际工作中，同一遗址会采集系列或多个样品检测。部分遗址还采用热释光测年，该方法是通过检测陶瓷器中矿物晶体受辐射累积能量来确定年代的考古技术，与碳十四测年法相比，热释光测年法误差相对较大，多被作为辅助测年手段。

需要指出的是，部分遗址同时采用了碳十四和热释光两种测年技术，在两种技术手段测年结果基本相符的情况下，热释光的误差范围明显偏大。少量遗址热释光与碳十四检测年代偏差较大，在此情况下采信碳十四测年结果。部分遗址碳十四测年数据未经树轮校正，通常情况下未经树轮校正的数据较校正后年代会稍晚，这一情况不影响对万年遗存的判定。还有一些遗址处于湖泊岸边，近年的研究表明，海洋、湖泊的碳库效应会影响碳十四测年结果，使检测年代偏老，中国国家博物馆等对山东大口遗址的测年研究表明，受海洋碳库效应影响，其碳十四测年数据偏早250年左右[23]。湖泊碳库效应明显低于海洋，且本文对测年数据的运用在于确认遗存是否属于广义上的万年遗存，非具体遗址或考古学文化的精确年代，故而上述两类影响可忽略。梳理各遗址测年及其他信息，可得表1。

3 遗址选址

上述遗址选址按照地理环境可分为四类：第一类选址于山地环境中河流两岸的台地、阶地，如小南山遗址、转年遗址、东胡林遗址；第二类选址于平原环境的河流两岸台地，如于家沟遗址、赵家徐姚遗址；第三类选址于平原湖泊岸边环境，如后套木嘎遗址、四台遗址；第四类选址于丘陵溪谷环境，如李家沟遗址、兴隆遗址、四麻沟遗址和裕民遗址。徐水南庄头遗址现代环境为平原，地表只有一条小河，河床较浅而遗存埋藏较深，二者应无涉。遗址地层内有湖相堆积，对于华北地区古代环境的研究表明，距今

表1　北方地区万年遗存基本信息

Tab. 1　Basic information of 10,000-year-old sites in the northern China regions

遗址名称	遗存年代	遗迹	遗物	环境信息	共存遗存
南庄头遗址[5]	距今10500—9700年 样本：淤泥、木头、木炭、陶片 技术：碳十四未校正，热释光误差较大不采信	G3和G4两条沟、Z1和Z2两个烧土坑	陶片（44件）、骨器、石器、动物骨骼等	现代：华北平原北部，东侧有小河 古代：平原湖泊	战国时期遗存，与万年遗存有自然地层间隔
转年遗址[6]	距今9800—9200年 样本：未注明 技术：碳十四未校正	无	陶片（70余件）、石制品（18000余件）、动物骨骼	现代：燕山山脉内，白河二级台地 古代：同	商周时期遗存，与万年遗存有自然地层间隔
于家沟遗址[7]	距今11600—11100年 样本：陶片、地层沉积物 技术：热释光	无	陶片（2件）、石制品（2803件）、骨器、动物骨骼等	现代：泥河湾盆地，桑干河三级阶地 古代：同	无
东胡林遗址[8]	距今11000—9000年 样本：木炭、动物骨骼、人骨、陶片 技术：碳十四	灰坑、火塘、墓葬	陶器、骨器、蚌器、石器、动物骨骼等	现代：燕山山脉内清水河三级台地 古代：同	无
李家沟遗址[9-11]	距今10500—8600年 样本：木炭、动物骨骼 技术：碳十四	南区第6层细石器文化遗存见石圈；北区第5、6层，南区第5层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见石块聚集区	南区第6层细石器文化遗存出土陶片2件、磨制石锛1件、打制石器1000余件及动物骨骼；北区第5、6层，南区第5层新石器时代早期遗存出土陶片100多件、打制石器与磨制石器及动物骨骼	现代：嵩山东麓丘陵区，板椿河二级阶地 古代：同	裴李岗文化遗存，与万年遗存有直接地层叠压
四台遗址[12]	第一组距今10400—10000，第二组距今9400—9000年 样本：木炭、动物骨骼 技术：碳十四	第一、二组遗迹均为房址	石器、动物骨角、陶片	现代：坝上草原，湖泊西岸坡地 古代：同	第三、四、五组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兴隆遗址[13,14]	第一期距今8700—8100年 样本：未注明 技术：碳十四	第一期遗迹为房址	动物骨骼、石器、陶片	现代：蒙古高原南缘低山丘陵，季节性河流河岸坡地上 古代：同	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及第二至五期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裕民遗址[19]	第四层距今8400—7600年 样本：木炭、人骨、动物骨骼 技术：碳十四 第四层距今8600—7300年 样本：地层堆积物 技术：光释光	房址	骨器、石器、陶片	现代：蒙古高原南缘低山丘陵，冲沟北侧坡地 古代：同	无

续表

遗址名称	遗存年代	遗迹	遗物	环境信息	共存遗存
四麻沟遗址[18]	未公布早期测年资料，认为早期遗存年代与裕民遗址接近	早期圆形房址	未明确划分早期遗物，有陶片	现代：蒙古高原南缘低山丘陵，冲沟东侧坡地 古代：同	中晚段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小南山遗址[15,16]	距今15000—8775年 样本：木炭 技术：碳十四	火塘、堆石、墓葬、灰坑	陶器、玉器、石器	现代：万达山脉，乌苏里江西岸山地 古代：同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赵家徐姚遗址[17]	距今13200年 样本：未注明 技术：碳十四	火塘	动物骨骼、陶片、陶塑、石制品	现代：山前冲击扇平原，距淄河约1.5 km 古代：同	汉代墓葬，打破早期遗存地层
双塔遗址[2]	距今万年前后 样本：人骨、陶片 技术：碳十四、热释光	灰坑、灰沟、墓葬、柱洞	陶片、石器、骨器等	现代：松嫩平原西部，洮儿河北岸约4 km岗地 古代：湖沼畔岗地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后套木嘎遗址[3]	距今12900—11100年 样本：陶片、人骨、动物骨骼、有机质样品 技术：碳十四	灰坑、灰沟、墓葬	鱼骨、蚌壳、动物骨骼、石制品、陶片	现代：与洮儿河联通的新荒泡湖畔坡地 古代：同	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遗存，直接地层叠压

万年左右地表水充沛，湖泊众多[24,25]。双塔遗址虽然距离洮儿河较近，但洮儿河所在区域为平原环境，河流摆动大，阶地发育差，其所在山岗并非河流台地，其南北两侧均为低洼地，近年开辟稻田，此前为湖沼环境。所以，徐水南庄头和双塔两遗址的选址应归于第三类（图1）。

对专项田野考古调查而言，除选址外，遗址内共存遗存也是重要的参考因素，从这一点出发，可将上述万年遗存分为三类：第一类是遗址内只有万年遗存，未见其他时期遗存，如于家沟遗址、东胡林遗址和裕民遗址；第二类为遗址内有其他时期遗存，但与万年遗存不衔接，在地层上存在间隔层，如徐水南庄头遗址、转年遗址、小南山遗址和赵家徐姚遗址；第三类为遗址内有其他时期遗存，且与万年遗存存在地层叠压打破的衔接关系，如李家沟遗址、四台遗址、兴隆遗址、四麻沟遗址、双塔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

综合选址分类，可以得出选址于平原临湖或丘陵沟谷的万年遗存多与其他时期遗存共存，在调查过程中应予以重点关注。共存与否的成因需要进一步探讨。

首先看选址于山地河流两岸的遗址。转年遗址选址于白河岸边的山前台地上，遗址内没有明显的遗迹现象，出土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包含少量陶片和动物骨骼，该遗址应是一处石器制作场所。东胡林遗址选址于清水河岸边的山前台地上，遗址内发现有火塘、灰坑和墓葬等遗迹，出土遗物较为丰富，包含打制石器、细石器、陶片、骨器、蚌器及动植物遗存等。从遗迹和遗物看，东胡林遗址是一处人类长期生活的场所，是传统意义上的遗址。小南山遗址选址于乌苏里江岸的山上，遗址内发现的遗迹有火塘、房屋、堆石、墓葬和灰坑，出土遗物包括陶器、玉器和石器，该遗址是一处遗存丰富的古代遗址。



图1　北方地区万年遗存分布示意图

Fig.1　Schematic diagram of the distribution of 10,000-year-old sites in the northern China regions

如果没有发现少量的陶片，转年遗址和东胡林遗址可以被看作旧石器时代遗存。这一时期，人类生活于山地河流两岸，依托河流的水、石资源及山林内的动植物资源开展生产生活，在石料资源丰富区域会形成较为固定的石器制作场所，死后即埋葬于生活区域或周边。在制作使用陶器不久，居民即迁移，未继续在此生活。从发现的遗存看，小南山遗址内居民自旧石器时代末期即生活于此，直至新石器时代早期。

选址于平原区域河流两岸的遗址有于家沟遗址和赵家徐姚遗址。于家沟遗址处于桑干河岸台地上，遗址内未见明显的遗迹，出土遗物以石制品和动物残骨为主，有少量陶片和骨器，该遗址应是一处石器和骨器制作场所。赵家徐姚遗址位于淄河北岸约1.2 km处，遗址内发现有火塘、红烧土堆积等迹象，出土遗物主要为动物骨骼、陶片和陶塑，还包含石器和蚌器，该遗址应是古代人类的生活区。从这两处遗址看，生活在平原区域的古代人类主要依赖河流的水资源和石料资源开展生产生活，陶器产生后也进行了迁移。

选址于平原湖泊岸边的遗址有双塔遗址、后套木嘎遗址、四台遗址和南庄头遗址。双塔遗址位于洮儿河北岸约4 km的土岗上，土岗前后皆为洼地，积水较为严重，现被开辟为水田，孢粉分析表明遗址此时期为植被覆盖率较高的草甸环境[26]。遗址内发现的遗迹有灰坑、灰沟、墓葬和柱洞以及文化层，出土有较多的陶器，还出土有石器、骨器和蚌器等工

具及工艺品，遗址内还发现有大量动物骨骼及鱼骨。遗址内的柱洞表明当时已经有了建筑类遗存，墓葬、灰坑和文化层的发现表明遗址此时期是一处古代人类长期生活场所。

后套木嘎遗址选址于新荒泡东岸岗地上，该区域周边河、湖纵横，遗址内发现的遗迹有灰坑、灰沟与墓葬，出土有陶片及少量石器。遗迹内发现有大量鱼骨、蚌壳和少量动物骨骼。这些遗存说明此时期生活于此的古代人类主要依赖湖内的渔业资源。后套木嘎遗址还发现有第二期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万年左右，可与第一期文化遗存接续，发现的遗迹有墓葬、灰坑和灰沟，出土遗物依旧以陶器为主，兼有少量石器，遗迹内常见鱼骨、蚌壳，动物骨骼数量有所增多。这表明后套木嘎遗址是一处古代人类长期生活场所，生产活动以捕鱼为主，狩猎活动逐渐增多。

四台遗址选址于坝上草原的四台蒙古营子淖西岸坡地上，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房址，出土的遗物主要有石器，包括打制石器和石磨盘、石磨棒等工具，还出土有骨、角器和陶片。从出土遗物来看，此时期在此生活的古人类生计方式以采集、狩猎为主。与后套木嘎遗址一样，四台遗址也发现有在年代上接续的第二期文化遗存，年代为距今9400—9000年，发现的遗迹与第一期遗存相同，均为房址，出土遗物构成与第一期相类，包括石器与骨、角器和陶片，这一时期出土有较多的动物骨骼，说明此时期人类狩猎水平提高。

南庄头遗址现代环境为平原，古环境研究及遗址内的地层堆积均表明遗址当时所处的环境为湖沼环境。遗址内发现的遗迹主要有灰坑、灰沟和灶，出土遗物除陶片外，还有石磨盘、磨棒类石制品，此外还出土有骨、角器及动物骨骼等。从遗迹和遗物看，南庄头遗址也是一处较为典型的古代人类生活类遗址，当时主要的生计模式为采集与狩猎。

选址于丘陵临河或沟谷环境的遗址有李家沟遗址、兴隆遗址、四麻沟遗址和裕民遗址。李家沟遗址选址于嵩山东麓丘陵区椿板河两岸，遗址内发现的遗迹与其他遗址同时期遗存相比现象不明显，仅见石块聚集区，出土遗物以石制品为主，发现有石磨盘等工具，还发现有动物骨骼及陶片，说明遗址在此时期为一处人类活动场所，主要活动为石器制作和狩猎。遗址内还发现有年代上可接续的细石器时期文化遗存，主要遗迹为石圈，出土有大量石制品和破碎的动物骨骼。这表明遗址在细石器时期和新石器时代早期生产生活方式上有着较高的一致性。遗址内还发现有少量的裴李岗文化陶片，表明遗址此后也有零星的人类活动。

兴隆遗址位于坝上丘陵区，选址于山谷西坡上，谷底有季节性溪水，遗址内发现的主要遗迹为房址，这些早期房址多被晚期房址叠压打破，也即古代人类在同一位置上反复修建、修葺房屋。出土的遗物以动物骨骼为主，还有石磨盘、磨棒类石制品与骨、角器及陶器。该遗址古代人类应以狩猎采集为主要生计模式。兴隆遗址上述遗存年代为距今8700—8100年，距离万年有一定的差距，但遗址内还发现有地层上可接续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该时期遗存未发现遗迹，遗物以细石器为主，兼有少量磨石。这表明兴隆遗址内最早的陶器遗存虽然年代上晚于其他遗址，但性质上并无不同。遗址内除可向上接续的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还有年代上向下接续的数期遗存，遗迹与遗

物大体一致，反映了该遗址古代长期稳定的社会生活状态。

四麻沟遗址同样位于坝上丘陵区，东距兴隆遗址不到10 km，西距裕民遗址不足5 km，遗址选址于沟谷东侧的坡地上，发现的遗迹主要为房址，形态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圆角长方形和长方形，发掘简报称房址多有二层台结构，这些所谓二层台，宽窄、高矮均不一，房址内柱洞有的分布于二层台下边缘位置，有的分布于二层台上边缘位置，结合房屋形态不同和兴隆遗址发现的房屋叠压迹象，四麻沟遗址房址的二层台显然也为不同时期房屋叠压产生的迹象。遗址内出土遗物较多，以石制品为主，有石磨盘、磨棒类石制品，还出土有陶器和骨、角器等。遗址内出土的陶器纹饰类型较为多样，也有进一步分期的可能，从地理位置和遗存类型看，四麻沟遗址都与兴隆遗址有着较高的一致性。

裕民遗址与四麻沟遗址、兴隆遗址同处于坝上丘陵区，三者相邻分布，遗址选址于沟谷西北侧坡地上，南邻一条季节性溪流。遗址内主要遗迹为房址，还有少量灰沟和墓葬，房址为半地穴式，平面呈圆形或椭圆形，也见有不同时期房址叠压形成的二层台迹象。遗址内出土大量石磨盘、磨棒类石制品和动物骨骼，还有少量陶器和骨器。陶器以圜底和尖圜底器为主，显示出较早的时代特征。遗址内还出土有和兴隆遗址同类的陶片状器。从出土遗存上看，裕民遗址、四麻沟遗址与兴隆遗址具有较高的一致性，兴隆遗址具有较为清晰的层位关系和年代划分，可作为三者的典型代表。

4　遗存表象及成因

从上述材料我们可以总结出一些古代人类生活的基本表象，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古代人类惯常居住于河流特别是山区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主要生产活动为打制石器和狩猎。陶器产生后不久，人类放弃了传统的活动区域，迁徙至丘陵溪谷或平原湖畔环境，开展狩猎、采集、捕鱼活动，石器制作活动减少，开始了定居生活。兴隆遗址内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遗存显示，在陶器产生之前，古代人类已经开始由河流两岸转移至坝上丘陵生活，从出土的大量石制品和动物骨骼来看，主要的生产活动和此前一样为打制石器和狩猎，同时出土的磨石类石制品表明采集加工活动也逐渐兴起。而后，更适宜烹饪加工植物籽粒的陶器出现，说明采集活动的权重不断增加。从采集活动逐渐增多这一角度来看，陶器的出现是古代人类强化采集加工活动产生的工具，是果而非因。

对凉城岱海湖和赤峰达里诺尔湖的沉积物研究表明，距今万年前后，区域环境转向暖湿，植被为森林草原[27-29]。森林草原环境适宜动植物生存，直至近现代，内蒙古地区仍存在野生的黄羊群。对塞罕坝植物资源的调查研究表明，这一区域不仅可食用植物资源丰富，且存在区域集聚性分布[30,31]。结合考古遗存来看，在旧石器时代末期，古代人类已经开始强化采集加工活动，这种强化促成了两个结果：其一是以兴隆遗址人群为代表，人类开始向植物资源丰富且集聚性高的坝上丘陵区域转移；其二是以东胡林遗址人群为代表，仍居住于山区河流两岸，开始制作、使用陶器，强化对植物籽粒的加工利

用。最终，居住于河流两岸的人群没有坚持下去，迁移至坝上丘陵区域的人群在采集活动中也开始制作、使用陶器，在丘陵溪谷间繁衍生息。四台遗址表明部分人群向更平坦的草原区域迁徙，在湖泊畔落脚长期生活。集聚性的动植物资源使狩猎与采集更易产生结余和积蓄，为了储存和保管结余的积蓄，房屋和窖穴（灰坑）随之产生，也为动物驯化和植物资源管理种植提供了基础，上述种种使此时期遗存面貌与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有了根本性的不同。

从兴隆遗址、四台遗址等使用时间较长的遗址还可以观察到另一个表象，即石制品数量的骤减，这一迹象表明石器制作这一生业活动的萎缩。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的石制品集中于F32和H23等数处遗迹内[32]，表明在距今8000年前后，打制石器活动仅为少数人或家庭所承袭。较之旧–新石器时代过渡阶段，还能观察到另一个表现为磨制石器和骨、角器的出现与增多，据此可以得出的直观结论是磨制石器和骨、角器取代了此前的打制石器。其背后的原因不仅在于古代人类离开河流进入丘陵区后打制石器所需原材料减少，还有加工采集植物籽粒促进了磨制技术的发展和普及，磨制技术的出现使此前不适宜打制的石料和骨、角都可以作为加工原料使用，从技术和原料上替代了打制石器。

小南山遗址、双塔遗址的发掘表明，这一时期，随着磨制技术的发展，玉器作为磨制石器的升级产品开始出现，在日常生活中作为兼具装饰功能的随身物品使用，也被广泛用于陪葬。这一时期的墓葬仅见于东胡林遗址、小南山遗址、双塔遗址及后套木嘎遗址。东胡林遗址选址于山区河流两岸台地，墓葬处于生活区内，墓葬内随葬有石器、蚌壳等遗物。小南山遗址墓葬选址于山上，与房址等生活区域没有明显分界，墓葬内随葬有玉器、石器等遗物。双塔遗址及后套木嘎遗址均选址于湖泊岸边，各见一座墓葬，墓葬狭小且不规整，均随葬有骨锥、蚌壳。根据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对这一时期丧葬行为做出推定，这一时期生活于山区河流两岸的古代人类死后埋葬于生活区，并未形成专门的墓地，随葬以生前使用的工具及随身饰品。四台遗址等发掘面积较大，发现墓葬较少或未发现墓葬，说明此时期可能已经出现独立于生活区域之外的墓葬区。

5 结语

综上，我们可以对距今万年前后人类社会生活发展变迁做逻辑上的梳理。初始，古代人类生活于山地中河流两岸的台地上，以打制石器和狩猎作为基本的生业模式，死后亦埋葬于生活区域。此后，人类逐渐强化了对植物资源的采集和加工利用，以石磨盘、磨棒为代表的工具及陶器出现。人类开始向动植物资源集聚性更好的丘陵、草原区域迁徙，在此过程中，随着采集和狩猎活动的发展，出现了产品结余，为了储存保管，代表定居生活的房屋和窖穴出现。磨制技术的进步逐渐淘汰了打制石器活动，还促生了玉器，可能发展出独立的墓葬区域。

吉林省境内地理环境东部为长白山区，与北方地区发现的选址于山区的万年遗存相

比，土壤发育较薄，河流两岸阶地发育差，地表草木茂盛，不宜保存和发现遗存。中西部为松嫩平原，土壤发育好、土层厚，地表发育大量湖泊，与四台、于家沟等万年遗存环境相类，同时现地表环境多为耕地或草甸，利于保存和发现遗存。依此返回至研究该问题的初衷，本着先易后难、逐步加深研究认识等原则，吉林省万年遗存调查宜先在中西部开展。对考古调查项目而言，中西部地区范围亦过于广阔。有鉴于吉林省西部此前已发现有双塔遗址和后套木嘎遗址两处万年遗存，且两处遗存均分布于洮儿河流域，从现有基础出发，可先行开展洮儿河流域考古调查。根据上文梳理，选址于湖畔的万年遗存延续性强，多与其他时期遗存共存，地表遗迹、遗物线索相对明显，可作为调查的首要目标。选址于河流两岸的万年遗存延续性相对差，与其他时期遗存共存性差，地表遗迹、遗物线索少，可积累一定经验和认识后再予以重点关注。

后记　2025年春，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组成团队对洮儿河两岸进行了系统调查，发现了一批万年遗存线索，可能与文中第一、三类遗存有关，相关材料后续将整理成调查简报刊发。

参考文献

[1]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仙人洞与吊桶环[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4.
[2] 段天璟, 王立新, 汤卓炜. 吉林白城市双塔遗址一、二期遗存的相关问题[J]. 考古, 2013(12): 58-70.
[3] 王立新. 后套木嘎新石器时代遗存及相关问题研究[J]. 考古学报, 2018(2): 141-164.
[4]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吉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 环月亮泡地区区域性系统考古调查报告[M].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3.
[5] 李君, 乔倩, 任雪岩. 1997年河北徐水南庄头遗址发掘报告[J]. 考古学报, 2010(3): 361-392, I0007-I0010.
[6] 郁金城. 从北京转年遗址的发现看我国华北地区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的特征[G]//北京市文物研究所. 北京文物与考古: 第五辑[G].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02: 37-43.
[7] 夏正楷, 陈福友, 陈戈, 等. 我国北方泥河湾盆地新-旧石器文化过渡的环境背景[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01, 31(5): 393-400.
[8] 赵朝洪. 北京市门头沟区东胡林史前遗址[J]. 考古, 2006(7): 3-8.
[9] 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新密市李家沟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2011(4): 3-9.
[10]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北区2009年发掘报告[G]//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 第9卷. 北京:文物出版社, 2013: 177-207.
[11]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郑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 河南新密李家沟遗址南区2009年发掘报告[G]//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北京大学震旦古代文明研究中心. 古代文明: 第9卷[M].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13: 208-239.
[12] 赵战护, 龚湛清, 李军, 等. 河北尚义县四台新石器时代遗址[J]. 2023(7): 14-28.
[13] 郭明建, 邱振威, 王刚, 等. 河北康保县兴隆遗址2018—2019年发掘简报[J]. 考古, 2021(1): 3-25, 2.
[14] 赵娜, 王建平, 郭明建. 河北康保兴隆遗址的光释光测年研究[J]. 第四纪研究, 2022, 42(5): 1297-1310.
[15] 李有骞, 宋嘉骐, 杨永才, 等. 黑龙江饶河县小南山遗址2015年Ⅰ区发掘简报[J]. 考古, 2024(2): 3-16, 2.
[16] 李有骞. 小南山遗址2019—2020年度考古发掘新收获[N]. 中国文物报, 2021-03-19(5).
[17] 赵益超, 孙倩倩. 从临淄赵家徐姚遗址看旧新石器过渡阶段[N]. 中国社会科学报, 2023-05-18(4).
[18] 包青川, 陈文虎, 胡晓农, 等. 内蒙古化德县四麻沟遗址发掘简报[J]. 考古, 2021(1): 51-74, 2.

[19] 胡晓农, 包青川, 李恩瑞, 等. 内蒙古化德县裕民遗址发掘简报[J]. 2021(1): 26-50.
[20] 李占扬. 关于中原地区新、旧石器时代文化过渡问题的思考——以灵井遗址为例[G]//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 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 考古学研究: 七.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08: 302-308.
[21] 卢瑞宇. 海岱地区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研究[D]. 长春: 吉林大学, 2022.
[22] 刘爽, 焦越涵. 碳十四测年考古在中国的发展历程[G]//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 吉林大学边疆考古研究中心, 边疆考古与中国文化认同协同创新中心. 边疆考古研究: 第32辑. 北京: 科学出版社, 2022: 394-398.
[23] 张昕煜, 闫欣, 王明辉, 等. 海洋碳库效应对沿海地区人骨碳十四测年的影响——以山东砣矶岛大口遗址为例[J]. 考古, 2025(6): 105-122.
[24] 郭盛乔, 王苏民, 杨丽娟. 末次盛冰期华北平原古气候古环境演化[J]. 地质论评, 2005, 51(4): 423-427.
[25] 吴忱. 华北平原四万年来自然环境演变[M]. 北京: 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 1992.
[26] 汤卓炜, 王立新, 段天璟, 等. 吉林白城双塔遗址孢粉分析与古环境[J]. 考古学报, 2013(4): 534-536.
[27] 孙千里, 周杰, 沈吉, 等. 北方环境敏感带岱海湖泊沉积所记录的全新世中期环境特征[J]. 中国科学: 地球科学, 2006, 36(9): 838-849.
[28] 杨光林. 达里湖17.8-6.8 ka BP期间的水位演化及古气候环境[D]. 北京: 中国地质大学, 2017.
[29] 刘瑾, 王永, 李廷栋, 等. 内蒙古中东部达里湖湖岸堤记录的12.5 cal ka BP以来湖面波动过程[J]. 古地理学报, 2016, 18(6): 1044-1052.
[30] 刘海莹, 吴秀霞. 塞罕坝野果植物资源及保护利用[J]. 河北林果研究, 1999, 14(2): 143-147.
[31] 黄金祥, 王建中, 冯天杰, 等. 塞罕坝植物区系新分类群与河北新分布Ⅱ[J]. 1996(2): 92-96.
[32] 内蒙古自治区考古研究所. 克什克腾旗南台子遗址[G]//内蒙古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 内蒙古文物考古文集. 北京: 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 1997: 87-95.

Discuss site selection of 10,000-year-old sites in northern China

MENG Qingxu
Jilin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Changchun 130033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sites dating back around 10,000 years have attracted much attention. Jilin Province is preparing to conduct a special archaeological survey. In order to better carry out the work, this paper sorts out archaeological sites dating back around 10,000 years in northern Chin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ite selection, these sites can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the first one is located on the terraces on both banks of mountain rivers, the second one is located on both sides of plain rivers, the third one is located in hilly valleys, and the fourth one is located on the banks of plain lakes. By combining the cleared relics, a framework for the development and changes of human society around 10,000 years ago can be constructed. Humans first lived on both sides of rivers, especially in mountainous areas, and developed grinding techniques and invented pottery during the process of strengthening collection and production. Later, they migrated to resource rich hills and plain lake shores, and began to settle down. May form specialized burial areas, and a few people are buried in the relocation sites. The above framework can be used to identify key objects for archaeological investigations.

Keywords archaeological site; house ruins; pottery; collect